学术动态

# 俄罗斯清史研究概述

叶柏川

述及海外清史研究，当前学者更多关注的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清史研究成果，而很少提及俄罗斯的清史研究。俄罗斯清史研究，从研究年代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帝俄时期的研究，二是苏联时期以至当代的研究。由于中俄在这两个时期都存在着更为特殊的两国关系，因此，俄罗斯清史研究不仅历史久远，成果丰硕，而且独树一帜，对于我国清史研究工作意义重大。

## 一、帝俄时期的清史研究

俄罗斯帝国始于彼得大帝（1682－1725）时期，终于1917年罗曼诺夫王朝灭亡。因此，帝俄时期的清史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清朝同时代人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可分为译介类成果、研究类成果和史料类成果。

### （一）译介类主要代表人物及成果

1. 罗索欣

俄罗斯的清史研究，可追溯到18世纪上半叶俄国传教团来华初期。

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规定俄国传教团定期来华。由传教士和留学生组成的传教团，是一支外交兼学术的队伍。科学院的知名院士亲自为留学生制订科研大纲，并要求学生定期汇报自己的学术成就。最初，俄国传教团成员的学术活动以学习语言和翻译为主。他们非常注重学习满语，因为直到19世纪上半叶，满语一直是清朝的官方语言，他们在京期间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编写满语语法和词典。北京传教团中诞生了最初的汉学家兼清史专家。

罗索欣是第二届传教团成员，被称为俄国首位汉学家。他与列昂季耶夫合译的《八旗通志》，虽然以翻译为主，但是由于翻译过程中加入了大量注释，使其具有一定的学术性质。该书第17卷全部是注释，共323页，其中256页由罗索欣完成。罗索欣所做注释十分细致，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

罗索欣还留下其它一些译作：如《1730年京报摘抄》、《关于1735年中国各省钱粮的征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关于满洲皇帝、满洲军队的秘密配置及中国京城的状况》等。[①]

2. 列昂季耶夫

与罗索欣合译《八旗通志》的列昂季耶夫也是一位重要的清史学家。他翻译出版《大清律例》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又命其翻译《大清会典》。他的译作《中国思想》出版后引起极大反响，两次再版，并先后被译成德文和法文。其它译作有：《雍正遗诏》、图里琛《异域录》、《关于中国的茶叶与丝绸》等。[②]

### （二）研究类主要代表人物及成果

1. 俾丘林

如果说，罗索欣和列昂季耶夫的清史研究

［收稿日期］2007－5－10
［作者简介］叶柏川（1974－），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北京100872

还是以译介为主，那么，19 世纪上半叶，随着雅金甫·俾丘林的出现，俄国清史研究进人研究性阶段。俾丘林是第九届传教团团长，公认的俄国汉学奠基人，享誉世界。他的著述涉及中国历史、哲学、政治、地理、社会、语言、边疆民族等各个方面。

俾丘林在他的重要著作《中华帝国详志》(圣彼得堡，1842 年）和《中国的民情与风尚》(圣彼得堡，1848 年）中，向读者展示了自己眼中的 19 世纪的中国社会。这两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包含了关于中国地理、政治体制、法律、教育、经济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丰富信息。在每一卷的注释中，作者都列出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包括与他存在重大分歧的同时代研究者的观点。这两部著作已经由俄罗斯学者在 2002 年整理再版。俾丘林痴迷于中国文化，经常穿着中国服装游荡于市井之间。他在中国居住了 12 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了解，因此这两本书对于研究 19 世纪清代社会的意义不言而喻。

俾丘林的主要清史译著是《大清一统志》和《大清会典》。此外，他编写了《北京志》，详细介绍了北京的内外城及名胜古迹，并在书中附有北京地图。为了绘制这幅地图，俾丘林走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用脚步丈量长度。[3]

2. 瓦西里耶夫

瓦西里耶夫是 19 世纪下半叶俄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他对满族历史非常感兴趣，撰有《元、明两朝关于满族人的资料》。主要译作有：《清初对蒙古的征服》（译自《圣武记》)、《满洲志》、《宁古塔纪略》等。[4]

3. 阿列克谢耶夫

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一位承前启后的大汉学家，他的研究重点在文学领域，最重要的成果是翻译了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

**(三）史料类主要代表人物及成果**

1. 史林格

巴维尔·里沃维奇·史林格·冯·康什塔特，俾丘林同时代人，外交官兼学者及狂热的东方木刻作品和手稿收藏家，因在收集东方文化成果方面贡献突出，被俄罗斯科学院授予通讯院士称号，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现象。他虽不是清史学家，但他完成的一次考察却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恰克图贸易和中俄边境状况的一些资料。

1830 - 1832 年，史林格受命考察西伯利亚，主要任务是对贝加尔湖边区的佛教喇嘛进行整顿及考察俄中边贸状况。俾丘林与他同行。这次考察的资料收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圣彼得堡分所（全宗号 56)。主要内容包括：1820 - 1830 年的中俄贸易、自恰克图向东的中俄边界、贝加尔边区统计资料等。

全宗中有史林格自己撰写的《过去与当前的恰克图贸易》、《关于尼布楚周围边境地区秘密交换牲畜的记录》；还有索洛米尔斯基为史林格拣选的当时地方商人提交给伊尔库茨克省长办公厅的关于恰克图贸易的报告：阿斯卡谢夫的《关于同中国的贸易》、戈杰尔尼科夫的《在恰克图进行贸易的方法》、玛斯洛娃的《关于中国在恰克图贸易的看法》、梅荫多尔福的《关于恰克图贸易》、库兹涅佐夫的《关于同中国人的贸易》、《俄国商人对恰克图贸易的几点看法》、《1831 年完成的 1810 年在恰克图进行贸易的一等商人的笔记》、几份《恰克图交换货物一览表》等；此外是关于中俄边境状况的报告：《恰克图以东的中国边境》、《祖鲁海图地方的俄中哨所名称》、《中国边境地区的俄国哨所、堡垒的名称及其防守情况》等。

2. 康斯坦丁·安德里昂诺维奇·斯卡奇科夫

康斯坦丁·安德里昂诺维奇·斯卡奇科夫，第十三届俄国驻华传教团成员，著名的中国通，中文名字叫孔气，1849 - 1857 年居留北京，1859 - 1862 年任俄国驻塔城领事[5]，1870 年出任俄国驻天津总领事。此人外交经验丰富，成功地处理了 1870 - 1871 年的天津教案。他涉猎广泛，对中国的农业、天文、经济、政治都非常感兴趣，并留下大量手稿。

他每天读京报，完成《太平天国起义日子里的北京》，书中描写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北京的局势。为了保密，报告用密码文字写成，米亚斯尼科夫院士用了两年时间才破译全书并付诸出版。他还留下另外两部很薄的著作《中国的农业》（在书中介绍了中国茶叶的种

植)、《中国天文学的命运》，现已出版。

与斯卡奇科夫有关的资料收藏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斯卡奇科夫全宗（全宗号273)，主要内容包括：斯卡奇科夫日记（政治日志、天津日记、上海日记等)；斯卡奇科夫定期发送外交部亚洲司的报告及各种临时报告；中俄贸易（恰克图贸易、塔城贸易、天津贸易、汉口贸易、茶叶贸易)；中国经济(农业、工业及资源)；中国天文学；中国法律；斯卡奇科夫的通信；中、英、法关系等。

3.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伊格纳季耶夫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伊格纳季耶夫，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曾任内务大臣、亚洲司司长等要职。1859 年他被派作俄国驻华公使，以调停身份利用英法进攻北京之机，强迫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北京续增条约》。

伊格纳季耶夫留下的资料保存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730)。这部分资料的时间范围是 19 世纪 50 - 70 年代，主要是伊格纳季耶夫担任使节期间的资料。内容涉及：普提雅挺在华的活动、中俄贸易、《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北京续增条约》、传教团给伊格纳季耶夫的报告、伊格纳季耶夫同英法德的交涉等。

俄国外交部曾经出版了《伊格纳季耶夫使华资料》（圣彼得堡，1895 年)，其中部分档案应取自该全宗。

以上是帝俄时期的主要清史学家和研究成果。其中多数人都曾在中国长期居留，语言造诣深厚，在翻译中国经典和研究中国社会方面成就突出。最主要的是他们的著作包含了大量关于清代社会的信息，这对于中国学者的清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需要补充的是,当时俄国出版了大量中俄贸易方面的著作和统计资料,如特鲁谢维奇的《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19 世纪之前)》(遗憾的是后边没有参考书目)和柯尔萨克的《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等。这主要是因为追求在华的商业利益始终是俄国对华政策的重点。

## 二、苏联时期以及当代的清史研究

苏联时期的清史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70 - 80 年代出现的成果普遍带有政治色彩。90 年代以来，俄国学者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开始关注政治以外的其它问题，如北京传教团、历史文献编纂学、中西文化交流、清代社会经济史等。但是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仍占少数，清史研究从总体上讲，仍然延续了注重政治关系的传统。以下简要介绍苏联时期以来的重要清史学家及其成果。

### （一）彼得·叶梅利扬诺维奇·斯卡奇科夫

彼得·叶梅利扬诺维奇·斯卡奇科夫，是一位对俄国汉学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他历经几十载，撰成《俄国汉学史纲》。这部著作研究了 19 世纪末以前的近 250 年的俄国汉学史，介绍了俄国汉学家研究中国历史、语言、文化等问题的大量著作。附录收录了俄国汉学家手稿及其藏点的详细目录。这本书至今仍是俄国汉学家入门、也是我们了解俄国清史研究的必读之作。此外，斯卡奇科夫主编了一本重要的工具书《中国书目》，第一版收录了 1730 - 1930 年的俄国汉学论著目录，在 1932 年出版；后来为了研究需要，将目录补充到 1957 年，第二版于 1960 年出版。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图书馆茹拉夫廖娃女士在纪念斯卡奇科夫诞辰 100 周年的论文集《时间是割不断的》的附录部分补充了她续编的 1958 - 1991 年发表的中俄关系论著目录。

### （二）斯拉德科夫斯基

斯拉德科夫斯基曾任俄国驻华贸易领事，他的专著《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 年以前)》，阐述了远古和中世纪居住于现苏联和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经济联系的发展过程，以及从 17 世纪至 1917 年俄国与清帝国间的贸易经济关系史。但是，本书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 （三）齐赫文斯基

齐赫文斯基院士是当今俄罗斯的汉学泰斗，他具有外交家和汉学家的双重身份，同时也是著名的清史专家。他的两部主要著作是《19 世纪末中国的改良运动》和《中国走向统一与独立之路（1898 - 1949)》。齐赫文斯基和米亚斯尼科夫主编的《17 - 20 世纪俄中关系》档案与文件集，是研究清代中俄关系最

重要的一部资料集。现在已经出版了17世纪的1-2卷，18世纪的1-3卷和19世纪的第1卷，其内容涵盖了《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以及戈洛夫金使团来华等问题。

**（四）米亚斯尼科夫**

科学院东方学所米亚斯尼科夫院士，是当前俄罗斯最著名的清史学家之一。他在清史研究方面著述丰富：关于清俄关系的专著《17世纪的清帝国与俄国》、关于中俄边界的专著《条约款项业已规定，17至20世纪俄中边界外交史》、参与主编的著作《中国边疆形成史》等。

2006年出版了米亚斯尼科夫的论文集[6]，其中包括作者关于清史问题的文章，如《18世纪中华帝国对俄国的新认识》、《出使清帝国的戈洛夫金使团》、《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俄华银行及其在中亚国际关系史中的作用》、《17世纪中国人对俄国的认识》、《尼布楚条约的历史意义》、《关于巴伊科夫使华前准备情况的新资料》、《俄国与清帝国在17世纪第一个25年间的外交关系》、《俄清关系的历史文化特点》、《出使北京的弗拉基斯拉维奇·拉古津斯基使团》、《新出版的斯帕法理的著作》等。

米亚斯尼科夫首先提出应关注俄国驻华传教团问题的研究。在他的倡导下，近年来，北京传教团问题逐渐成为俄国汉学研究的热点。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和圣彼得堡神学院已经举行了四次主题为“东正教在远东”的学术研讨会，并结集出版。其中相当一部分论文是关于北京传教团，如萨莫伊洛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北京传教团》、多罗宁《传教团成员著作中的清帝国史（18-19世纪中叶）》、诺夫哥罗茨卡娅《北京传教团在中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7]

舒宾娜的副博士论文《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在中国（18世纪至20世纪初）》对传教团在中俄关系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2006年，亚历山德罗夫主编的《北馆——俄国驻华传教团简史》一书出版。东方学所圣彼得堡分所学者在波波娃的主持下正陆续整理出版俾丘林的手稿。

但是，俄国学者对北京传教团的研究尚不深入，介绍性质的成果居多。

**（五）华可胜**

华可胜是一位近年来在中俄关系问题上著述颇丰的学者。他的专著《俄罗斯与中国——理论与国家关系史》（1999）考察了近四百年的俄中关系史。另一部专著《1881年俄中圣彼得堡条约交涉史》，是关于1880—1881年间中俄伊犁问题交涉经过及圣彼得堡条约的签订。

需要说明的是，在中俄政治关系问题上，俄国学者的普遍观点仍然是，清政府推行向周边国家扩张的对外政策，19世纪下半叶中俄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使阿穆尔地区回到了俄国的怀抱。

**（六）涅波姆宁**

2005年，涅波姆宁出版了《清史》一书，这是俄罗斯学者写的第一部清史。著作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内容包括：17世纪的第二个25年、传统社会的发展周期结束、满族人占领中国、清朝建立、危机和混乱、农民战争、19世纪的反抗运动等；第二部分内容为：过渡社会的形成、鸦片战争的后果、陷入例行的危机周期、专制灭亡、建立共和等。但令人费解的是，书中没有一条注释。

**（七）多罗宁**

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多罗宁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清代历史文献学研究，他在专著《17-18世纪中华帝国的历史文献编纂学》中指出，中华帝国的历史文献编纂学是中华文明的独特现象，是绝无仅有的。它在政权的庇护下建立和发展起来，在儒家君主专制体系中变成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作者描述了中国历史文献编纂学的结束阶段——17-18世纪，认为这是最大限度展示其所有本质特征的阶段。

**（八）霍赫洛夫**

科学院东方学所的霍赫洛夫教授，在俄国档案馆中耕耘一生，对中俄关系档案的情况了如指掌。尽管专著不多，但是他写了大量关于清代中俄贸易问题的文章，在每篇文章中都引用了档案资料。如：《19世纪60-90年代的恰克图贸易：俄国商人和当地的蒙古、中国居民间的关系》、《H. O. 奥格洛布林关于19世

纪20－40年代的恰克图的回忆》、《19世纪下半叶的俄中贸易及俄国对华政策》、《19世纪60－80年代在华的俄国商人》《关于1861年从恰克图前往北京的商队——清政府对〈北京条约〉签订后的中俄贸易的态度》、《В. П. 瓦西里耶夫谈恰克图和恰克图贸易》、《18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中叶的恰克图贸易》等等。

**（九）费什曼**

费什曼的《中国在欧洲：神话与现实（13－18世纪）》，多年来一直是研究中国和欧洲、东方和西方关系学者的案头必备之书。该书的第一、二章介绍了旅行家、商人、传教士带给欧洲的关于中国的信息，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中国做出了评价，奠定了中国“神话”的基础；第三章介绍欧洲思想家和哲学家为了同君主专制和天主教会进行斗争的需要，是如何将耶稣会士对中国的理想化阐释进行了转化的；第四章介绍同中国造型艺术（主要是那些用于出口的艺术品）的接触，扭曲了欧洲人对中国及其艺术的认识，这些艺术品的仿造品改变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

总的来讲，俄罗斯在苏联时期和近年来的清史研究具有以下特点：1、研究成果丰富，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清史学家；2、优秀成果集中于中俄政治问题，关于中俄贸易、文化交流以及清代社会、文化、法律等问题的成果较少；3、与美日学者不同，俄国学者的研究偏重宏观问题，对微观问题不是特别关注。

---

①②③④⑤П. Е. 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Наука”, 1977, с. 42－45.（П·Е·斯卡奇科夫《俄国汉学史纲》，（俄罗斯）科学出版社，1977年，第42－45页；第72－76页；第94页；第212－213页；第163－164页。）

⑥ В. С. Мясников Квадратура китайского круг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АН, 2006.（В·С·米亚斯尼科夫《中国难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出版社，2006年。）

⑦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275 лет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3.（《东正教在远东》，圣彼得堡，1993年。）